

藝術
YI SHU

建築
JIAN ZHU

梵宮
FAN GONG
倡編 赵朴初 主編 周紹良

佛教
FO JIAO

中國
ZHONG GU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梵宫:中国佛教建筑艺术/赵朴初倡,周绍良主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6
ISBN 7-5326-1287-2

I. 梵... II. ①赵...②周... III. 佛教—宗教建筑—建筑艺术—中国 IV. TU-09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8103 号

《梵宫——中国佛教建筑艺术》编辑委员会

倡 编 赵朴初
主 编 周绍良
编 委 (按姓名笔画为序)
王 新 孙大章 吴元真 吴立民
吴梦龄 李家振 楼庆西 魏承彦

梵宫——中国佛教建筑艺术

作 者 孙大章 傅嘉年 罗哲文 杜仙洲
屠舜耕 宿 白 杨 泓 徐伯安
责任编辑 陆海龙
执行编辑 崔明晨 刘志宏 康 丽
装帧设计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郑子杰 肖 辉 王 梓 卜秀敏
摄 影 楼庆西 宗同昌 杨立泉等

出版发行 /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辞书出版社

地 址 /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邮 编 / 200040

电 话 /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hai.com.cn

印 刷 /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1194 1/16

印 张 / 17.25

字 数 / 200 千字

版 次 /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5326-1287-2/B·38

定 价 / 248.00 元(精装本)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21—64855582

目 录

第一章	汉地佛寺布局初探…宿白/1
	一、东汉三国的佛寺布局/2
	二、东晋南北朝的佛寺布局/4
	三、隋代佛寺布局/13
第二章	中国佛寺中的佛殿建筑…孙大章/19
	一、佛殿的形成与发展/20
	二、中国佛殿的形式分类/25
	三、佛殿建筑的艺术造型/45
	四、佛殿建筑构架的技术成就/55
	五、佛殿中的壁画、塑壁与彩画/61
	六、佛殿的装饰和装修/72
第三章	中国早期佛教建筑布局演变及殿内像设的布置…傅熹年/81
第四章	中国古代佛教石窟的窟前建筑…杨泓/103
第五章	佛塔——中国古代高层建筑的杰作…罗哲文/125
	一、佛塔的历史/126
	二、佛寺与塔的发展/130
	三、各种建筑材料的佛塔/138
	四、佛塔的类型/153
第六章	经 幢…杜仙洲/181
	一、幢是佛教密宗的历史产物/182
	二、幢的来源和功用/183
	三、石幢形式的演变/184
	四、石幢功能的多样化/189
第七章	我国南传佛教建筑概说…徐伯安/197
第八章	藏传佛教建筑…屠舜耕/223
	一、早期佛教寺院/224
	二、古格时期的佛教建筑/228
	三、教派形成时期的佛教寺院/234
	四、格鲁派(黄教)寺院/245
	五、藏传佛教寺院的艺术特征/265
后 记	……/270

第一章 汉地佛寺布局初探…宿白

一、东汉三国的佛寺布局

佛教东传,以《魏略西戎传》所记:“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和《牟子理惑论》所记“昔孝明皇帝(57-75年在位)……遣使者……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弘明集》卷一)两事最足凭信。后者,《魏书·释老志》有较详记录:

“(明)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愔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阳雍门西……佛既谢世,香木焚尸,灵骨分碎,大小如粒……胡言谓之舍利,弟子收奉,置之宝瓶,竭看花致敬慕,建官宇谓之塔。塔亦胡言,犹宗庙也,故世称塔庙……魏明帝曾欲坏官西佛图,外国沙门乃金盘盛水,置于殿前,以佛舍利投之以水,乃有五色光起。于是,帝叹曰:自非灵异安得尔乎。遂从于道东,为作周阁百间。佛图故处凿为濠汜池,种芙蓉于中。……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官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晋世,洛中佛图有四十二所矣。”

魏收记录虽较晚出,但主要事迹皆有来源,其记洛阳白马寺佛图“为四方式”,故与2世纪末即汉献帝之初,笮融于彭城、广陵间兴建的浮图祠极为相似。笮融浮图祠见《三国志·吴志·刘繇传》:

“笮融者,丹阳人。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丹阳运漕,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

《后汉书·陶谦传》亦记此事,文字略有差异:“同郡人笮融,聚众数百,往依于谦。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运粮,遂断三郡委输,大起浮图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

据《三国志裴注》和《后汉书章怀注》,约可推知两传史实皆出袁晔《献帝春秋》。晔晋人,曾祖绥,汉末曾领广陵事^[1],所记广陵轶闻应可徵信^[2]。两传记录浮图祠(寺)文字可相互补充;如再参观魏收所记洛阳佛图,则自东汉迄魏晋佛寺的建置情况,大体可作以下推测:

一、佛寺制度传自印度,以供奉舍利的塔——浮(佛)图为中心建置,故称之

[1] 参看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十二古史类《献帝春秋》条。

[2] 《弘明集》卷一录未详作者的《正诬论》亦记此事:“汉末有笮融者,合兵依徐州刺史陶谦……融先事佛,遂断盗官运以自利入,大起佛寺云云”。僧祐列此文于牟子《理惑论》后,宗炳《明佛论》前。汤用彤先生谓:“或作于孝武帝(372-396年在位)之前”。参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一章《释慧远》。

为浮图祠(寺)。

二、洛阳白马寺盛饰浮图,为四方式,其形制是从一级至三、五、七、九级的重构,即重楼形式;上累铜(金)槃九重,即塔上表相之九轮;衣以锦彩的黄金涂像,应即位于塔内的鎏金佛像。

三、塔周围建有宽阔的周阁(阁道、堂阁),此周阁或与后来的回廊相类,并兼具围墙作用。此外,《释老志》所记白马寺佛图甚妙之画迹,据《理惑论》,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作礼拜佛塔之像。是此画迹内容^[3],亦足证明当时佛寺特重重楼形制之浮图也。

浮图作重楼形制,约与两汉以来上层统治者多于宅第主院之侧,兴建之多层楼观有关。此种多层楼观的图像,屡见于河北东汉砖室墓壁画、山东画像石和河南、四川画像砖,而近年甘肃东汉墓一再发现的陶楼院明器,更具立体造型;其中正式刊露的以随葬铜车马群闻名的武威雷台汉墓所出的陶楼院极为壮观^[4]。该陶楼院各构件全部施黄绿釉,院平面长方形,周绕院墙,墙前面正中建门楼,墙上四隅建角楼,各角楼间置设有栏杆的天桥,院墙内左、中、右三方又设复墙,复墙内中部立通高1.05米的五层高楼。楼院中部的五层高楼相当于佛寺的重楼,院墙与复墙之间应即相当于周阁位置,是当时佛寺布局,约可据此类陶楼院的建置仿佛复原。盖东汉魏晋时期,人们视西方之佛同于汉地敬祀之神仙,神仙好楼居,《史记·封禅书》有武帝建楼台招候神人的记事:

“公孙卿曰:仙人可见……陛下可为观……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楼居……(武帝)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茎台,置祠具其下,将招来仙人之属……方士有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上许作之”。^[5]

下迄刘宋,鲍昭《凌烟楼铭》犹云楼为神居之所:

“瞰列江楹,望景延除,积清风路,含彩烟途……我王结驾,藻思神居,宜此万春,修灵所挾”。(《艺文类聚》卷六三)

基于以上汉地的传统认识,奉佛像于仙人居处之重楼,自是最为适宜。

河南支谦^[6]“汉献末乱,避地于吴,……从吴黄武元年(222年)……出《维摩》……等四十九经”(《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是为佛教传入江南之最初事迹。南方创建佛寺,又迟至赤乌十年(247年),见事具录于《出三藏记集》卷一《康僧会传》:

“(康僧)会欲远流大法,乃振锡东游,以赤乌十年至建业,营立茅茨,设像行道……(孙权)即召会诘问有何灵验。会曰:如来迁迹忽逾千载,遗骨舍利神曜无

[3]“千乘万骑绕塔三匝”,疑即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中习见之八王争分舍利之图像。该图绘出八国王率象兵、马兵、车兵、步兵抵于拘尸城下的情景。绘画的位置多在中心塔柱窟内中心塔柱的左、右、后三壁,其例如克孜尔第98、4、8号诸窟。参看丁明夷等《克孜尔石窟的佛传壁画》,刊《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4]参看甘肃省博物馆《武威雷台汉墓》,刊《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5]《艺文类聚》卷六三引《史记》:“方士言武帝曰:黄帝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帝乃立神明台、井干楼,高五十丈,辇道相属”。

[6]支谦字恭明,《出三藏记集》卷七录道安《了本生死经序》称“河南支恭明”。

方,昔阿育起塔乃八万四千。夫塔寺之兴,所以表遗化也。权以为夸诞,乃谓会曰:若能得舍利,当为造塔……果获舍利……权大嗟服,即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曰建初寺。因名其地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兴。”

可见江南创寺之初,亦重建塔。至于该塔的具体形制,如据康僧会与洛阳佛教关系密切^[7]考察,似亦应是重楼形式。

二、东晋南北朝的佛寺布局

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发展迅速,寺院布局逐渐复杂的情况,约从5世纪末以后,日益显著,而南方变革之巨远逾于北方。现为突出演变之迹,即以5世纪末为界,试分东晋南北朝时期为前后两段。

前段自晋室南渡,迄于南齐武帝(482—493年在位)和北魏孝文迁洛(494年)。

东汉以来以佛塔为主的佛寺布局,东晋南北朝时期前段仍占优势,故葛洪《字苑》释塔云:“塔,佛堂也”(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六)^[8]。所以文献也多有建塔即建寺的记录,如《高僧传》卷十四《慧受传》云:

“释慧受,安乐人。晋兴宁(363—365)中,来游京师……尝行过王坦之园,夜辄梦于园中立寺……每夕复梦见一青龙从南方来,化为刹柱。受将沙弥试至新亭江寻觅,乃见一长木随流而下。受曰:必是吾所梦见者也。于是,雇人牵上,竖立为刹,架以一层,道俗竞集,咸叹神异。坦之即舍园为寺。以受本乡为名,号曰安乐寺。”又如《出三藏记集》卷十四《僧伽跋摩传》记:

“僧伽跋摩……以宋元嘉十年(433年)步自流沙,至于京师……初,景平元年(423年),平陆令许桑舍宅建刹,因名平陆寺。后道场慧观以跋摩道行纯备,请住此寺……跋摩共观加塔三层,行道讽诵,日夜不辍。”

刹即佛塔^[9]，“舍宅建刹”，则刹即寺也。北方较早之例，有《水经注河水》所记之平晋神庙：

“又东径平晋城南。今城中有浮图五层，上有金露盘，题云：赵建武八年(342年)比释道龙和上竺浮图澄树德劝化，兴立神庙。浮图已坏，露盘尚存，炜炜有光明。”

金露盘即刹上相轮，题铭所云之神庙即佛寺，浮图五层当即指神庙而言。此

[7] 参看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六章《佛教玄学之泛滥·康僧会》节。

[8]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七：“塔，古书无塔字。葛洪字苑及切韵：塔即佛堂；佛塔庙也。”

[9] 参看钮树玉《说文新附考》卷六，罗振玉《面城精舍杂文甲编·敬史君碑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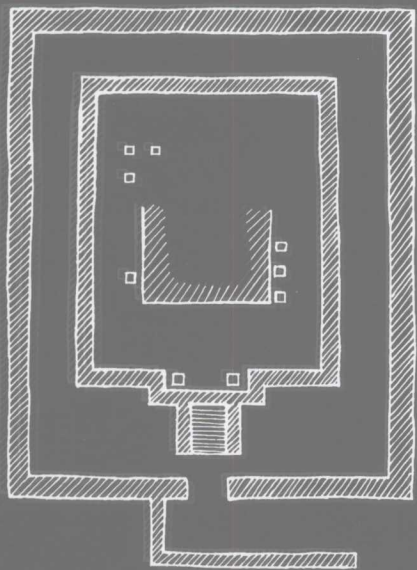


图1
大同方山思远灵图遗址平面示意图

后,北魏事例如《魏书·释老志》所记:

“高宗践极(452年),下诏曰……今制: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令限……显祖即位,敦信尤深……其岁(465年),高祖诞载,于时起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

所谓“建佛图一区”和永宁寺之七级佛图,皆是以塔为主的寺院。又《魏书·高祖纪》上记:

“(太和三年[479年]八月)乙亥,幸方山,起思远佛寺”。^[10]

此寺即《水经注·漯水》所记之思远灵图:

“(方山)岭上有文明太皇太后陵,陵之

东北有高祖陵。二陵之南有永固堂……院外西侧有思远灵图。”

思远灵图遗址近年已调查多次,现就1976年北京大学考古实习调查的情况,著录如下。(图1)遗址位于今山西大同旧城北约20公里的方山上,文明太皇太后的永固陵位遗址之北约1200米。遗址现为一方形台地,外围绕以东西约50米、南北约85.5米、平面作长方形的院墙。墙内中部有东西约30米、南北约40米的塔基,塔基前面正中有砌阶遗迹。塔基之上,中部为约10米见方的中心塔柱,现存残高已不足一米,塔柱四周残存方形础石九个。遗址院墙内外,散布大量板瓦筒瓦残片和莲花文瓦当等。中心塔柱附近出有影塑佛像和菩萨像残体。^[11] 遗址破坏严重,原来塔的形制已无法进一步复原;但遗址内除此塔基外,别无其他殿堂遗迹,因知文献所记之思远寺所以又名思远灵图者,即以该寺之主要建置仅此佛塔。是建寺即建塔,在北方直迄孝文帝时,仍是当时北魏皇室所习用之佛寺布局。

佛寺的主要建置即一佛塔,故当时南北方皆有以塔的层数呼作寺名者。如《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道安法师传》记道安“住长安城内五重寺”。刘义庆《宣验记》记“谢晦身临荆州,城内有五层寺”(《广弘明集》卷十二)。又如《魏书·释老志》记“兴光元年(454年)秋,敕有司于(平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12]

[10] 《魏书·释老志》记此事于太和元年(477年):“太和元年……又于方山太祖营垒之处,建思远寺”。

[11] 此次调查所获资料,俱存北京大学考古博物馆。

[12] 参看中华书局标点本《魏书·释老志校勘记》[一七]。

东晋以来,佛教在南北方都得到统治阶级的大力支持,一般信徒普遍增多,寺院布局除了如上所述沿袭旧制外,文献还较多地出现了扩大寺院建置或兴建其他房舍的记录。《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记兴宁三年(365年)道安抵襄阳立寺,除起塔外,另建大批房舍:

“(道安于襄阳)更立寺,名曰檀溪,即清河张殷宅也。大富长者并加赞助,建塔五层,起房四百”。

其后,道安弟子惠永、慧远先后赴庐,皆建精舍,立堂殿。前者见《名僧传抄·惠永传》:

“晋太和中(366—371),(惠永)于寻阳庐山……南岭之上筑葺房宇,构起堂殿,与烟霞交接,名曰凌云精舍”。

后者见《高僧传》卷六《慧远传》:

“伪秦建元九年(373年),秦将苻丕寇并襄阳……远于是与弟子数十人南适……及届浔阳,见庐山峰净静,足以息之,始住龙泉精舍……(刺史)桓(伊)乃为远复于山东更立房殿,即东林是也……(远)复于寺内别置禅林……营筑龕室”。沈约《栢园寺刹下石记》记王劭建精舍,亦先建房殿:

“江左晋故车骑将军瑯琊王劭玄悟独晓,信解渊微,于太祖文献公清庙之北,造栢园精舍……虽房殿严整,而琮刹未树”……^[13](《广弘明集》卷十六)

《塔寺记》记王景琛所建精舍中起佛殿:

“驸马王景琛为母范氏,宋元嘉二年(425年)以王坦之祠堂地与比丘尼业首为精舍。十五年(438年)潘淑仪施西营地以足之,起殿。又有七佛殿二间,泥素精绝”。(《建康实录》卷十二)

此外,《续高僧传》卷五《僧旻传》记庄严寺建讲堂:

“庄严讲堂,宋世祖立”。^[14]

《名僧传抄·僧伽罗多罗传》记钟山精舍和王巾《头陀寺碑文》记头陀寺皆刹堂并举,建置日渐繁杂。前者文云:

“元嘉十年(433年),卜居钟山之阳,剪开榛芜,造立精舍,耸刹凌云,高堂架日”。

后者文云:

“头陀寺者,沙门释慧宗之所立也……宋法师行洁珪璧,拥锡来游,以为宅……宋大明三年(465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经象,后军长史江夏内史会稽孔府君讳觊为之薙草开林,置经行之室;安西将军郢州刺史江安伯济阳蔡使君讳兴宗复为崇基表刹,立禅诵之堂焉”。(《文选》卷五九)^[15]

[13] “琮刹未树”之后,沈约续记云:“劭玄孙尚书仆射南凉州大中正奘深达法相,洞了宗极……食不过中者一十一载……誓于旧寺光树五层,捐割藩俸十遗其一,凡厥所收三十有六万。齐之永明六年(488年)六月三日,盖木运将启之……三界五道咸同斯愿。刊石重壤,式昭厥心。”按王劭卒年约在义熙初,即5世纪初,是栢园精舍建房殿之后80年才补建佛塔。

[14] 宋世祖即宋孝武帝,在位年代是452—464年。

[15] 《李善注》:“碑在郢州,题云:齐国录事参军琅邪王巾制。”

至于刹、堂(殿)各自的方位,《律相感通传》明确著录荆州河东寺塔在殿前:

“荆州河东寺者,此寺甚大。余(道宣)与慈恩寺嵩法师交故积年,其人即河东寺云法师下之学士也……莫测河东之号,请广而述之……答曰:晋氏南迁……此荆楚旧为王都……有宜都之目……仍于此地置河东郡,迁裴、柳、薛、杜四姓居之。地在江曲之间,类蒲州河曲,故有河东名也。东西二寺者,苻坚伐晋,荆州北岸并没属秦,时桓冲为荆州牧,要翼法师度江造东寺,安长沙寺僧,西寺安四层寺僧。苻坚败后,北岸诸地还属晋家,长沙、四层诸寺(僧),各还本寺。东西二寺因旧广立……殿一十二间,唯两柱通梁,(长)五十五尺,栾栌重叠,国中京观,即弥天释道安使弟子翼法师之所造也。自晋至唐,曾无亏损。……殿前塔,宋谯王义季所造,塔内塑像及东殿中弥勒像,并是切利天工所造……”

而长干寺和湘宫寺还出现了双塔。长干寺双塔见录于《高僧传》卷十三《竺慧达传》:

“竺慧达晋宁康(373—375)中至京师。先是,简文皇帝(371—372年在位)于长干寺造三层塔,塔成之后,每夕放光。达上越城顾望……夜见刹下时有光出……乃于旧塔之西,更竖一刹,施安舍利。晋太元十六年(391年)孝武更加为三层。”^[16]

湘宫寺双塔见录于《南齐书·良吏·虞愿传》:

“(宋明)帝(465—472年在位)以故宅起湘宫寺,费极奢侈。以孝武(452—464年在位)庄严(寺)刹七层,帝欲起十层,不可立,分为两刹,各五层。”

寺院兴建殿堂,在北方亦出现于4世纪,如《魏书·释老志》所记:

“天兴元年(398年)……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官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岁,始作五级佛图、耆闾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绩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

又记北魏于5世纪开凿佛殿型石窟寺:

“和平初(460年)……(沙门统)昙曜白(文成)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此石窟寺即今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开窟五所”即今云冈第16至20窟。五窟内皆只奉佛像,是我国现存有年代可考的最早的五座佛殿类型的石窟。云冈石窟《水经注·漯水》亦有记录:

“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祇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径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

[16]《梁书·诸夷·海南诸国传》记此事云:“西河离石县有胡人刘萨何……出家名慧达,游行礼塔,次至丹阳,未知塔处,乃登越城四望,见长干里有异气色,因就礼拜,果是有王塔所,屡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众就掘之,入一丈得……三舍利……即迁舍利近北,对简文帝所造塔西,造一层塔。(太元)十六年又使沙门僧伽伽为三层。”

林渊锦镜，缀目新眺”。

酈道元所记石窟寺工程，主要完成于太和十八年(494年)迁洛以前。^[17]其时，这里已是规模弘大建有“山堂水殿”及“诸窟室”的一处佛教大寺院。此处大寺院值得注意的另一迹象，是至少有四处以相邻的两窟组成一组“双窟”的情况。此四处双窟有三种布局：

一、以两个佛殿型窟所组成，即第7、8窟和第9、10窟。(图2)

二、以两个塔庙型窟所组成，即第1、2窟。(图3)

三、以一个佛殿型窟和一个塔庙型窟所组成，即第5、6窟；第5窟位于东侧，是佛殿型窟，第6窟位于西侧是塔庙型窟。(图4)

以上四组双窟皆建于迁洛前孝文帝在位(471—494)时，这是由于特殊的政治历史背景而出现的^[18]。同样的政治历史背景，陕西澄城发现的《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所记晖福寺也出现了和云冈第1、2窟类似的安排，碑文云：

“我皇文明自天，超世高悟……遐想虚宗，遵崇道教。太皇太后圣虑渊详，道心幽畅……绍灵鹫于溥天，摹祇桓于振旦……散骑常侍安西将军吏部内行尚书宕昌公王庆岢资性明茂，秉心渊懿……翼赞之功光于帝庭……乃敕竭丹诚，于本乡南北旧宅，上为二圣造三级佛图各一区，规崇爽垲，择形胜之地……禔功锐巧，穷妙极思，爰自经始，三载而就，崇基重构，层栏叠起，法堂、禅室，通阁连晖……谅罕代之神规，当今之庄观者矣……廓兹灵图，曾是晖福，庆崇皇居，爰建图寺……太和十二年(488年)岁在戊辰七月己卯朔一日建……秘书著作郎傅思口制文”。(《石交录》卷三)^[19]

晖福寺除“崇基重构，层栏叠起”之二区三级佛图外，尚有法堂、禅室、通阁等其他建置，是该寺在整体布局上，疑与前述同具双塔的东晋长干寺、刘宋湘宫寺更为接近。

东晋南北朝后段，自5世纪末迄6世纪80年代初南北朝结束。其间关键的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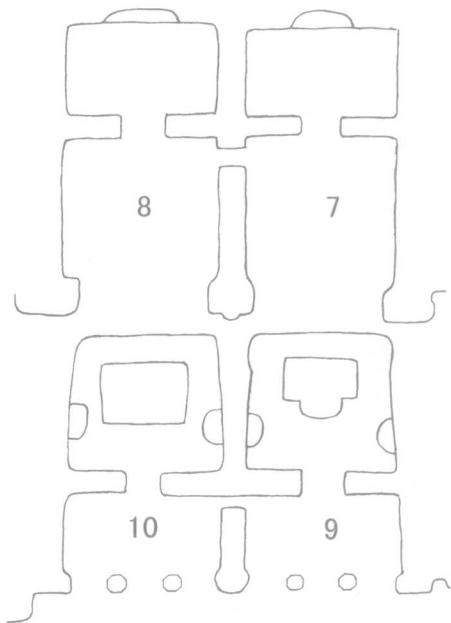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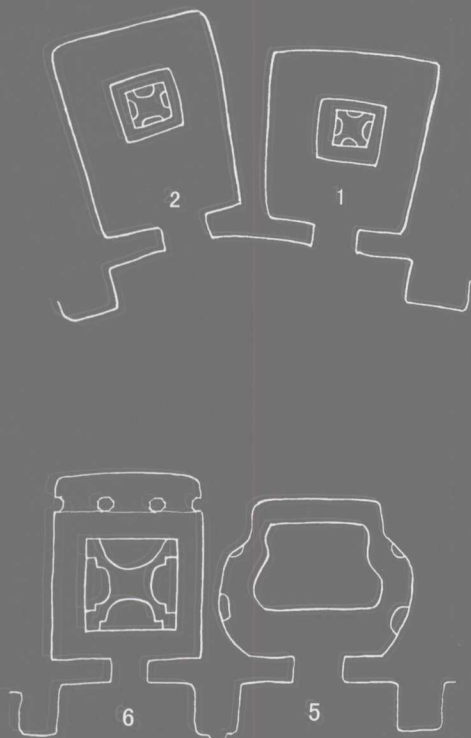


图2(左页图)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7、8窟和第9、10窟平面示意图
图3(右页上图)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1、2窟平面示意图
图4(右页下图)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5、6窟平面示意图

[17] 参看拙著《云冈石窟分期试论》，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18] 参看拙著《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

[19] 该碑现存西安陕西省石刻博物馆(碑林)。



期,南方是“五十许年江表无事”(《续高僧传》卷一《宝唱传》)的梁,北方则在北魏迁洛以后的宣武、孝明阶段。是时,南北两方佛教皆在急剧发展,各地普遍建寺,一般寺院的布局虽多依旧,但皇室高第的建置则日趋繁杂,如齐明帝时(495—498年在位)郢州建头陀寺有层轩、飞阁,见王巾《头陀寺碑文》:

“(齐明)诏,西中郎将郢州刺史江夏王观政藩维,树风江汉……宁远将军长史江夏内史行事彭城刘府君讳瑄……以此寺……功坠于几立……因百姓之有余……于是民以悦来,工以心竞……层轩延袤……飞阁逶迤……法师释昙珍业行淳修,理怀渊远,今屈知寺任。”(《文选》卷五九)

此种层轩飞阁,似可从现存原建多层木构的浙江新昌天监十七年(518年)雕像竞工的剡溪龕像推知其工程巨大^[20]。天监以降,梁武帝大事修建佛寺,普通元年(520年)为父建大爱敬寺,后又为母建大智度寺。普通三年(522年)改建阿育王寺,大通元年(527年)兴建同泰寺,以上诸寺皆极庞大奢侈。《续高僧传》卷一《宝唱传》著录大爱敬等三寺云:

“(梁武)为太祖文皇于鍾山竹涧,建大爱敬寺,纠纷协田,临睨百丈,翠微峻极,流泉灌注,鍾龙遍岭,飏风乘空,创塔包岩壑之奇,宴坐尽山林之邃。结构伽蓝,同尊园寝,经营雕丽,奄若天官。中院之去大门,延袤七里,廊庑相架,檐霏临属。旁置三十六院,皆设池台,周宇环绕,千有余僧四事供给。中院正殿有栴檀像,举高丈八……及终成后乃高二丈有二……。又为献太后于青溪西岸,建阳门路东,起大智度寺,京师夹里,爽垲通博,朝市之中途,川陆之显要,殿堂宏敞,宝塔七层,房廊周接,华果间发。正殿亦造丈八金像,以申追福,五百诸尼四时讲诵。寺成之日,帝顾谓群后曰:建斯两寺,奉福二皇……。又以大通元年(527年)于台城北,开大通门,立同泰寺,楼阁台殿则宸官,九级浮图回张

[20] 参看拙著《南朝龕像遗迹初探》,刊《考古学报》1989年第4期。

云表,山树园池,沃荡烦积。”^[21]

地方寺院规模之大者,如《律相感通传》所记之荆州河东寺:

“自晋宋齐梁陈代,僧徒常有数万人。陈末隋初,有名者三千五百人……寺房五重,并皆七架,别院大小合有十所,般若、方等二院庄严最胜,夏别常有千人。寺中屋宇及四周廊庑等减一万间。寺开三门,两重七间,两厦殿宇横没,并不重安,约准地数取其久固。”

道宣所述河东寺的建置,大约是梁和后梁的情况。佛寺兴建中院和设置别院,以上两记录应是较早之例。至于寺内塔、殿位置,从王勃《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碑》的记事:

“大宝庄严舍利塔者,梁大同三年(537年)内道场沙门昙俗法师之所立也……法师聿提神足,愿启规模,爰于殿前更须弥之塔”。(《文苑英华》卷八五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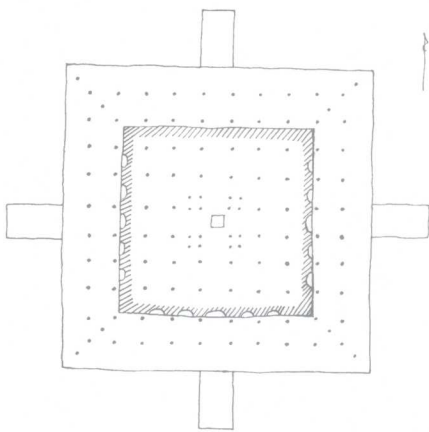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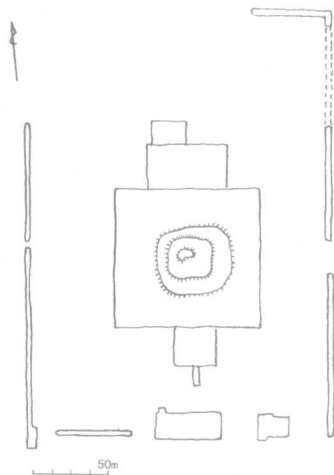
和《续高僧传》卷二七《慧耀传》的记事:

“(江陵)导因(寺),今天皇寺是也。

见有柏殿五间两厦,梁右军将军张僧繇^[22]自笔图画殿,其工正北庐舍那相好威严,光明时发。殿前五级亦放光明。”

可知亦如前文所述河东寺塔位殿前之制。又《梁书·诸夷·海南诸国传》记梁武改建阿育王寺曾新起双塔:

“(普通)四年(523年)九月十五日,高祖又至(阿育王)寺,设无寻大会,竖二刹,各以金罍、次玉罍^[23]重盛舍利及爪发,内七宝塔中,又以石函盛宝塔分入两刹下……(大同)十一年(545年)十一月二日,寺僧又请高祖于寺发般若经题,尔



[21] 《建康实录》卷十七引顾野王《舆地志》记同泰寺建置较详,录如下:“(寺)在北掖门外路西,寺南与台隔,抵广莫门内路西,梁武帝普通中起,是吴之后苑、晋廷尉之地,迁于六门外,以其地为寺。兼开左右营,置四周池堑、浮图九层、大殿六所、小殿及堂十余所。宫各像日月之形,禅窟禅房山林之内,东西般若台各三层,筑山构陇,豆在西北,柏殿在其中。东南有璇玑殿,殿外积石种树为山……起寺十余年,一旦震火焚寺,唯余瑞仪柏殿,其余略尽。即更构造而作十二层塔,未就而侯景作乱,帝为贼幽囚而崩。”

[22] 张僧繇即张僧繇。僧繇画天皇寺又见《历代名画记》卷七:“张僧繇,吴中人也。天监中,为武陵王国侍郎直秘阁知画事,历右军将军、吴兴太守。武帝崇饰佛寺,多命僧繇画之……江陵天皇寺,明帝置,内有柏堂,僧繇画卢舍那佛像。”

[23] 《建康实录》卷十七节录《梁书·海南诸国传》,“次玉罍”作“玉罍”。



夕，二塔俱放光明。敕镇东将军邵陵王纶制寺大功德碑文。”

是晋宋时出现的双塔，梁武创为分藏舍利之用。

北魏都洛约经40年，京城表里即“招提栴比，宝塔骈罗”。据《洛阳伽蓝记》作者杨街之统计，魏末“凡有一千余寺”（《洛阳伽蓝记序》）。《伽蓝记》记洛阳前塔后殿之寺最称博敞者，是卷一著录之永宁寺：

“永宁寺，熙平元年（516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官前阊阖门南一里，御道西……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刹上有金宝瓶，容二十五斛。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一十一重……浮图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僧房楼观一千余间……寺院墙皆施短椽，以瓦复之，若今宫墙也。四面各开一门，南门楼三重，通三阁道……东西两门亦皆如之，所可异者唯楼两重。北门一道，上不施屋，似乌头门……永熙三年（534年）二月，浮图为火所烧”。

此寺遗址已于1963年、1979年，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了考古探查和发掘，^[24]（图5）得知寺院平面长方形，南北约305米，东西约215米，周长1060米。东南西三面墙壁基部保存较好，每面各一门址，北壁破坏较甚，未见门道痕迹。正对南门位于寺院中心的塔基平面呈方形，有上下两层。下层基座在今地表下约0.5—1米，东西广约101米，南北宽约98米，夯土版筑，厚达2.5米以上。在下层夯土基座的中心部位，筑有上层夯土台基，其四面用青石垒砌包边，高2.2米，长宽均为38.2米（图6）。其上发现了124个方形柱础，分5圈排列。在第2圈（自外数）木柱以内，筑有一座土坯垒砌的实心方柱体，长宽均20米，残高约3.6米，在其南、东、西三面壁上，各保存着5座弧形的壁龛。这些壁龛均宽1.8米，进深20—30厘米，当为原设于中心方柱体上的佛龛。方柱北壁没有壁龛，却遗有20厘米见方的木柱残迹，或许原来登塔的木

图5（左页上图）

河南洛阳永宁寺遗址平面图

图6-1（左页下图）

河南洛阳永宁寺塔基上层台基平面示意图

图6-2（右页图）

河南洛阳永宁寺塔发掘现场

[24] 参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刊《考古》1973年第4期、《北魏永宁寺塔基发掘简报》，刊《考古》1981年第3期。

梯即架于此处。塔基之北有一座较大的夯筑殿堂残基。永宁寺遗址所示,可以明确:

一、寺每面设门,北面因建木构的乌头门^[25],所以径露的门道痕迹易毁而不显。

二、南门内建塔,塔后为佛殿,三者皆位于中轴线上。

三、四周绕以围墙,其内当为接建僧房楼观的所在。

之外,还清楚地表现了塔内中心设有列置佛龕的塔柱和周绕塔柱的礼拜道。这种塔的设计,恰与时间略迟于永宁寺的北魏洛阳城东大力山塔庙型石窟寺,即今巩县第1窟相似^[26],也和再迟些时的东魏、北齐邺城城西鼓山塔庙型石窟寺,即今河北邯郸北响堂第4、7两窟有接近处^[27]。除前塔后殿的佛寺外,《伽蓝记》亦多记有只建殿堂的寺院,如卷一之景乐寺:

“景乐寺,太傅清河文献王怱所立也……有佛殿一所……堂庑周环”。

又如同书、卷所记之建中寺:

“建中寺,普泰元年(531年)尚书令乐平公尔朱世隆所立也。本是阉官司空刘腾宅。屋宇奢侈,梁栋逾制,一里之间,廊庑充溢,堂比宣光殿,门匹乾明门……孝昌二年(526年)太后反政……没腾田宅……以宅赐高阳王雍。建义元年(528年)尚书令乐平王尔朱世隆为(尔朱)荣追福,题以为寺……以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堂。”

还有先建复殿重房,后补造浮图者,如卷三所记之景明寺:

“景明寺,宣武皇帝(499—515年在位)所立也……山悬堂光观盛^[28]一千余间,复殿重房交疏对霭,青台紫阁浮道相通……至正光年中(520—525),太后始造七层浮图一所。”

此外,洛阳东南嵩岳明练寺还建有双塔,见靖彰《大唐中岳永泰寺碑颂》:

神龙二载(706年)七月廿五日,有嵩岳寺都维那僧道莹奏闻:此故(明练)寺……千佛二古塔者,昔(北魏孝明[515—528年在位]为其妹)明练之所起。亭亭四照,巖巖摇空……”(《金石萃编》卷八九)^[29]

永泰寺现存二古塔,皆正方形密檐式砖塔,东塔十一檐,西塔七檐,形制与西安荐福寺塔(小雁塔)相类,约是曾经唐代重修者。^[30]

* * *

山西襄汾汾城乡北膏腴村东善惠寺,寺门内树九级砖塔一座,塔后为佛殿基址,此塔虽屡经重修,但相传始建于北齐。汾城乡,清为太平县治,《道光太平县志》卷十四记此寺云:

[25] 参看《营造法式》卷六小木作制度乌头门条。又见卷三二录乌头门图样。

[26] 参看《中国石窟·巩县石窟寺》图版9、42、75和实测图2、9—13,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27] 参看《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13图版—119—126、131—133,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28] 此句有脱误,参看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卷三。

[29] 该碑现存河南登封大塔沟永泰寺东北山坡下。

[30] 参看刘敦桢《河南省北部古建筑调查记》,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六卷四期(1937年)。

“善惠寺，在县西八里北膏腴村东，内有浮图高九层，北齐天统二年(566年)建。初名敬屈，宋嘉祐八年(1063年)赐今额”。

太平县隶平阳府，故《康熙平阳府志》卷三三亦记此寺：

“太平县善惠寺，在县西八里膏腴村，北齐天统二年建。初名敬屈寺，宋嘉祐八年赐今名。明初并慈化院入焉，置僧会司。”

塔建殿前仍沿旧制。此为现知有可能是唯一的一处北齐寺院遗迹，惟以该寺尚未进行详细调查，方志记录又未说明建年来源，因不便栏入文内，谨附此备考。^[31]

三、隋代佛寺布局

隋代佛寺仍以佛塔为主要建置，《续高僧传》卷十七《昙崇传》记崇于长安兴宁坊清禅寺建塔为皇室所重：

“开皇之初，敕送绢一万四千匹……(崇)建浮图一区，用酬国俸。帝闻大悦，内送舍利六粒，用同宏业。于时，释教初开，图像全阙，崇兴此塔，深会帝心……帝以功业别费，恐有匮竭，又送身所著衣及皇后所服者，总一千三百对以助随喜。开皇十一年(591年)晋王镇总扬越，为造露盘并诸花饰。十四年内方始成就。举高一十一级，竦耀太虚，京邑称最”。

同书卷三三《法力传》记法力重兴江都长乐寺亦首重建塔：

“江表沦亡，僧徒乖散，(力)乃负锡游方，访求胜地。行至江都，乃于长乐寺而止心焉。隋开皇十三年(593年)建塔五层，金盘景晖，峨然挺秀，远近式瞻。至十七年(597年)炀帝晋蕃又临江海，以力为寺任，缮造之功故也”。

仁寿间(601—604)，敕诸州建舍利塔，其选地凡在新建或重建的寺院中者，似皆以舍利塔为该寺的主要建置，如同上书卷二《彦伟传》所记之两例：

“仁寿初年，敕令(棕)送舍利于并州，时汉王谅于所治城，隔内造寺，仍置宝塔，今所谓开义寺是也^[32]……仁寿末年，又奉敕送舍利于复州方乐寺，今名龙盖寺也。本基荒毁，南齐初立，周废颓灭，才有余址，而处所显敞，堪置灵塔，令人治翦……”

其时，塔的位置仍多建殿前。197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唐长安青

[31] 张驭襄《长子法兴寺的唐宋元代建筑》曾提及此寺云：“唐及唐以前各代的佛寺里，都是塔前殿后的布局方式，例如汾城惠善寺、洪洞广胜上寺、寿州大报国寺等等。”误善惠为惠善。张文刊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2期(1989年)。

[32] 《续高僧传》卷十一《志念传》亦记此事云：“隋汉王谅作镇晋阳……谅乃于宫城之内，更筑子城，安置露塔，别造精舍，名为内城寺。引念居之，今之开义寺是也。”